分享悦读

在赓续文脉中传递文明之光

——读《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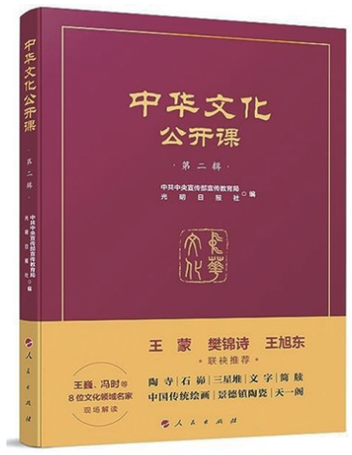
●孙庆伟

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光明日报社组织编写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文化传承发展主题图书《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近期出版,探寻文明密码、解析文明基因,带领我们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这是继该书第一辑之后,又一部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文化普及力作。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顺时应势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公开课》给出了切实有力的回答。《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中,8位业内权威专家学者分别聚焦陶寺、石峁、三星堆、文字、简牍、中国传统绘画、景德镇陶瓷、天一阁等极具代表性的中华文明载体和标识,以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事例进行生动阐释。虽然主题各异、各自成篇,但都彰显出华夏先民对生存发展的智慧探索,文明交流互鉴的独特印记,更具象化地诠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该书辅以近360张高清的文物和实景照片插图、近30个链接视频,让厚重历史可感可触,立体式、多维度呈现出中华文明格局、文明成就、文明旨趣的壮美画卷。

彰显文明格局之大。文明格局,不仅仅体现在体量规模、地域空间和时间跨度上,更在于一种超越时空范畴、融汇多元基因的宏阔结构与文明气度,体现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首先是“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黄河中游的陶寺遗址,展现出“最初中国”的王朝气象与礼制雏形,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迈向“一体”进程中的标志性遗址。与此同时,晋陕高原石峁遗址,以其规模空前、结构复杂的巨石城垣,揭示了中国北方地区独特的资源禀赋、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区域国家形态,是了解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实证。西南蜀地的三星堆文化,以那些制作精美、极具独特性的青铜神树、纵目面具与黄金权杖等,构建了一个充满奇幻瑰丽色彩的神权王国。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早期中华文明并非单点起源、线性发展,而是多区域文明彼此呼应、相互滋养,经历了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历史进程。其次是“有容乃大”的文明胸襟。陶寺的礼制因素,充分吸纳了海岱地区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文明成果;与此同时,陶寺文化与石峁文化亦有频繁交流互动,是至少共存300年的“黄河双雄”。石峁都邑处在欧亚草原廊道的南端,是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碰撞的通道。三星堆文化虽地处西南,与中原文明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青铜铸造技术、玉璋礼器等,都清晰可见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及至宋元明清,景德镇陶瓷贸联全球,成为世界认识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文化符号和桥梁纽带。

彰显文明成就之高。文明成就,不仅表现为物质遗存的体量和壮美,还体现在技术工艺的精湛、艺术思想的深邃,更体现在社会组织的体系化和治理能力的专业化上。从规模上看,陶寺遗址面积达到400多万平方米,包括不同功能的宫城及宫殿区、手工业生产区、居民区、墓葬区等,有着规整的布局与宏大的体量;石峁遗址则分为皇城台、内城和外城,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以气势恢宏的石砌城墙、结构复杂的城门体系与错落有致的建筑群落,成为北方地区早期国家都邑的典型代表。从技艺上看,三星堆先民将青铜器分体铸造再熔接的技术发展到了极致,器形巨大、造型诡谲的神树、立人像与面具等,不仅需要高超的冶金技术,更融入了独有的艺术想象力和信仰体系。宋代绘画形成了完备的体系和成熟的技法,笔墨挥洒之际,将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与哲学意境推向高峰。景德镇制瓷实现极致工艺与艺术创造力的完美结合,从原料甄选、拉坯成型到窑火淬炼,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高超的技术和智慧,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一张亮丽名片。从社会组织体系上看,陶寺社会具有王权国家和礼制社会两大核心特征,表现出严格的社会分层和礼仪秩序;石峁的城防布局和殉人墓葬,映射出早期国家的王权架构与阶层分化,昭示着国家形态的初步成型。景德镇窑场则形成了从原料开采、分工制作到成品外销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展现出手工业生产的成熟治理模式。天一阁藏书楼在选址、格局、书籍保护管理等方面都体现着系统的科学管理体系。



《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
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光明日报社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彰显文明底蕴之厚。中华文明的旨趣,不仅在于其器物之精美、制度之完备,更在于一种厚植于宇宙秩序、内化于生命道德、贯穿于人文化成的雅致和高远追求的文明境界。《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的诸多讲解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集中体现为“知天、崇德、尚文”三大核心旨趣。

“知天”就是敬畏天与自然,并将对宇宙天象的观察认知和顺应与现实秩序、精神价值相融合的文明实践。红山文化的祭坛,蕴含“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与沟通天地的神圣观念。陶寺城址宫城及宫殿区布局在“上风上水”的都城北部和偏东部,其观象台更以实证揭示了先民如何通过精密建筑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指导农业发展、服务社会治理。这些都体现了观乎天文、人文化成的核心理念,蕴涵着人类文明一种最深刻的关怀,即“天人合一”。“崇德”是中华文明独有的为人和治世准则,强调以德立身,以德治国,既重个人的德性修养,更推崇德政对民心的涵养。陶寺已经表现出“礼制”文明的规范秩序,夏代始祖大禹名为“文命”,体现了以“文德教化天下,以文化人”的文明追求。从孔子“为政以德”的倡导,到历代贤明君主以民为邦本,注重教化人心,“尚德政”使得文明根基愈加稳固。“尚文”是中华文明的鲜明标识,“以文载道、文德修心”,具体体现为对文字、文书的珍视,对藏书、刻书的执着。文字是人类由野蛮迈入文明的重要标识,中华先民对此具有深刻的感悟与认识,故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汉字的创造不仅是为了交流,更重要的是承载知识和思想,其形意之美承载着文化的基因。民间藏书和官府藏书交相辉映,守护和延续着文明的薪火。文人墨客以笔墨书写家国情怀,普通百姓以文字习得礼仪纲常。正是这种对“文”的尊崇,让文化成为修身之本、教化之基,让厚重高远的文明旨趣浸润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触摸文明脉搏,聆听千年回响。《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不仅是一部文化读本,更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巡礼,一扇瞭望中华文明的窗口。相信广大读者在这本书中能够更好地读懂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层逻辑和厚重底蕴,更能从中涵养敬畏历史、敬畏文化之心,激发出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推动中华文脉绵延繁盛、中华文明历久弥新。 (据《光明日报》)

石峁遗址皇城台 资料图片

佳作赏析

从影视到文学,不变的是好故事

——长篇小说《富甲天下大盛魁》创作谈

●梅锋

2月7日,以全集再版的影视剧改编小说《富甲天下大盛魁》,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了新书首发式。我作为电视连续剧《大盛魁》的编剧团队成员和小说联合作者之一,专门从北京赶来与会。现场嘉宾云集,书香满溢,在浓浓的喜悦之中,既有回忆的感慨,也有沉思的总结。现场发言时,我说了这么一段话:“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大家都说,如今已经是自媒体和AI的时代了,读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你们难道就不担心自己作品的前景吗?我的回答是,不担心。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件事:人类永远需要一个好故事!需要好故事,深深地刻进了人类的文化记忆,不管传媒的形式怎样千变万化,日新月异,这一点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而我们的小说,其中就蕴藏着一个好故事,只需要等待热情的读者们去把它打开。”

那么,这个像一坛多年老酒一样的好故事,又是怎样酝酿出来的呢?

2010年,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历经数年奋斗,终于摄制完成。这是以王新民导演为首,整个团队踏冰卧雪、呕心沥血所打磨出来的原创剧本。把它改编成小说,很快就在团队内部形成了共识,并最终确定由我与编剧团队另一位重要成员王路沙一起来承担这项工作。当年小说出版了第一册,不过其后由于种种原因,后续的出版发行搁浅了。

时间来到2023年,《大盛魁》实现了在内蒙古、天津、山西、湖北四大卫视及乐视网的同步播出,与全国观众见面,并以喜人的播出数据,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在这种形势之下,小说再版也被提上了日程,而我和王路沙对此则更有信心,更有干劲了。我们对之前的旧书稿进行了大幅的精修,包括将原来的“三部曲”改为上下两册,达到与电视剧的同频,也更适合读者的阅读。

在联合创作中,我和王路沙有着默契的分工。王路沙比较擅长宏观的故事框架的构建,他又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对于本地历史和民俗信手拈来。我的大学专业是社会学,平时也喜爱各种体裁的文学,我把这些都注入到了写作之中。

从剧本到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体裁和创作要求。我和王路沙有几个大的原则,是我们当初开始小说再版历程之时就确定下来的。

一是在整个电视剧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团队积累了关于“大盛魁”历史的海量素材与资料。数易其稿的剧本修改,有一些我们自己都觉得相当精彩的情节,最后定稿时不得不忍痛弃之不用。而在小说里,这些素材和情节,我们可以用合适的方式重新安排。

例如,两位主角、同属大盛魁创始人的王相卿和张杰在早期相遇时,处于一种互不信任的氛围,结果一个情节成为潜在的重要转折,也是《大盛魁》初稿剧本里面一场重头戏:他们遇到一条掉进陷阱的草原狼,王相卿不想理会,但张杰却冒着危险,把狼救出了陷阱。在初稿剧本中,二人还有这样的对话——

张杰:“要是一个人和一条狼都遭了难,我宁肯救狼!”

王相卿:“为甚?狼会吃人,人还会吃人么?”

张杰:“狼吃人,那是天性,而且它决不遮着藏着,你也知道,防得住。可人呢?你甭想知道一个人揣的是啥心思,到头来,若是让人害了,比被狼吃了还要惨呢!”

对于“张杰救狼”的情节,王新民导演和整个编剧团队当时都感到非常满意,但可惜后来考虑到拍摄的实际难度,还是把这场戏删除了。不过,它的传奇感,放在小说里头却是比较适宜的。这个情节对于塑造张杰这个人物的独特魅力,是有极大帮助的,能够使读者从这一极致的行为,去联想人物曾经有什么样的遭遇,形成了他什么样的内心。从王相卿的角度而言,这也是一个对他的触动,大盛魁未来大掌柜和二掌柜的联结,在此处已然有了扎实的注脚。

我们确立的第二个写作原则,是尽管小说来源于剧本,脱胎于剧本,但小说就是小说,有它自己的呼吸、自己的脉络、自己的生命力。这也是我和王路沙从一开始就自我要求的,如何实现从“影视感”到“文学性”的切换,属于一种体验非常不同的学习过程。与影像相比,文字带来的,完全是另一种想象空间,更细腻,更微妙,更能够扩展。我们在尽量保留剧本特色的基础上,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努力让大盛魁的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以及命运,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条原则的典型代表就是剧本和小说中的孙家第三代掌门人孙学增。他是剧本里台词提到过、但没有具体出场的角色,属于小说的二次创作。在书中,这个角色大大地丰富了孙家的人物线,并且有他自己的气质。孙学增将爷爷孙书同的传统性与父亲孙文举的悲剧性集于一身,构成了一个家族兴衰的完整面。

三是创新。作为《大盛魁》剧本的原创编剧,我和王路沙深知,我们笔下的故事,除了它的艺术感染力,还有更为重要的,那就是它的历史文化内涵与蕴藏其中的商业哲学,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而要满足这种综合性、多层次的表达,恐怕常规的写作手法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我们尝试着找到属于这个题材本身的最佳形式。

科幻大师刘慈欣说过,他想让自己的小说像是“未来的编年史”。我们的方法与之有一点儿相似,就是专门设计了夹叙夹议、跳进跳出等技术手段,以及大量使用史料和经济学知识。《大盛魁》的历史背景,跨越了清朝的康熙、雍正两代皇帝。在写作中,我们搜集各种与这段历史相关的素材,以此构建文本的时代感和人物的行动空间,像写到“康熙召见萨瓦”这一章节,还专门检索了真实的俄罗斯使臣到访清朝的文字记录,这其中就有萨瓦本人的,实现了史实与虚构的“互文”。这些使得小说不仅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也像是在对一段真实发生的历史进行归纳与评论,让小说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能够兼容。我们觉得,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改编,才是没有辜负这个文本的独特性,还有当初做这件事的初心。

回望来时路,可忆可感的还有很多。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已经面世的《富甲天下大盛魁》,未来会在读者们那里得到什么样的评价。这是一个作者最向往也最忐忑的期待。

书文评点

向河而歌

——读长篇纪实散文《黄河血脉》有感

●高银

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35期学员、巴彦淖尔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平原的长篇纪实散文《黄河血脉》近日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这不仅是内蒙古文学史上的一次盛事,更标志着作者文学视野与创作理念的一次新的飞跃。有幸获赠李平原老师亲笔签名的《黄河血脉》一书,认真阅读,细细品味,内心肃然起敬,果然是大家手笔,经典之作。

全书以“生态环境对黄河的影响”为命题,以“黄河在河套平原的流向”为主线,以其厚重的文化内涵与真挚细腻的笔触,引领读者步入一场关于河套平原黄河文化与土地、黄河与人民、黄河与生态治理、黄河与时代发展的深刻对话。全书分《也做河套治沙人》《寻迹黄河古道》《乌梁素海之歌》《行走黄河滩》四个篇章,从第一章第一节《戈壁孤岛》到末章末尾的《沙拉毛道》,全书共56节,洋洋洒洒26万字。这是作者继长篇小说《生来彷徨》《圜圄记》《山河如初见》,合著散文集《巴彦淖尔传》之后的又一部精品力作,图书已入选“草原书屋”工程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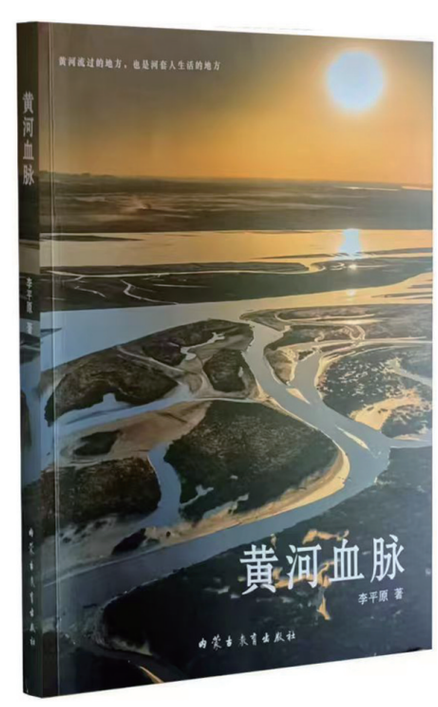
一部行走的黄河纪行。《黄河血脉》是作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生动实践。作者历时四年,走出书斋,迈向黄河、迈向沙漠、迈向阴山、迈向黄河古道、迈向河滩地、迈向黄河沿岸村落、码头,用双脚丈量黄河两岸。从亲手种植梭梭、柠条治理风沙,到徒步黄河沿岸村落、阴山,探访乌梁素海、黄河古道、码头、水库,考察乌兰布和沙漠,每一处足迹都承载着对故乡生态与文明的深切关怀,这部“走出来、看出来、想出来、写出来”的作品,融合了作者田野考察的扎实与行走文学的鲜活,堪称一部用脚步与心血写就的皇皇巨著。

一本黄河“根”与“魂”的精神图谱。作为文学作品,再伟大的思想、再浓烈的情感,最终成败都取决于作者对语言文字的驾驭和运用。没有好的文学语言,便没有文学作品。《黄河血脉》的成功在于其真挚细腻、灵动如泉的语言。全书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以平实细腻的笔触,将河套平原的自然风貌、人文历史、生态治理与民生发展、时代精神熔铸一起,娓娓道来,将河套人民的勤劳勇敢、善良质朴揉进奔涌的黄河血脉中。黄河不只是奔腾向东的黄河水,更是华夏文明的根,是中华文化的魂,是散落在黄河古道、旧道、黄河岸边每一个平凡生命的重量,是河套大地千年承载的中华文化的重量,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和文化符号。

文章结构层层递进,章节之间环环相扣,如同黄河水系般自然绵延。在朴实叙述中,黄河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承载着文明记忆、人类情感与文化根脉的精神之河,纪实散文展现出直抵人心的文学力量。

一次“踩进泥土”的生态文明书写。《黄河血脉》将纪实性、文学性、故事性融为一体,强调“双脚踩进泥土”的亲身经验。通过治沙人的视角、徒步者的见闻、观察者的思索,呈现出河套人民对生态治理的人文审视,也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深沉观照。这种田野调查式的创作方法不仅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近距离感、现场感,更能打动人,感动人,带领读者真切地了解我们的母亲河黄河,让作品耐读耐看,读来令人爱不释手。

一回文化根脉的深情凝望。《黄河血脉》深植于河套文化的厚重土壤。作者沿着乌拉河、乌加河等黄河故道深入追寻,将散落在古道岸边的历史痕迹、黄河村落、平凡人生与土地记忆串联起来。黄河血脉中流淌的不仅是河水,更是河套人民的勤劳质朴、千年文明的精神积淀。在强调文化自信与生态保护的今天,这部作品无疑是一次对民族根与魂的深情回望与坚定守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守护黄河记忆,赓续文明根脉,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作者以扎实的行走、凝练的笔力、敏锐的视角、深沉的情怀,完成了对一条河流的深情书写。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黄河纪行,更是文化、生态与心灵意义上的精神溯源,祝愿作者今后在文学道路上继续深耕,致行远,文常青。

地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世纪七路传媒大厦 邮编:010020 电话:编辑中心:6564020 采访中心:6564041 广告中心:6564079 6564060 印刷厂:6922934 发行中心:6922639 本报由呼和浩特市融媒印务有限公司承印